



大学文化职能新论

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机制研究课题组◎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大学文化职能新论

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机制研究课题组◎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文化职能新论 / 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机制
研究课题组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61-7350-3

I. ①大… II. ①大… III. ①高等学校—校园文化—
研究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73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87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1年4月24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演讲时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第一次将“文化传承创新”与高等学校的三大经典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并行。胡锦涛同志在论证高等学校的这一新职能时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展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风采，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胡锦涛同志这些观点鲜明、意义深远的指导性论断引起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那么，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提出这一论断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涵是什么？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及其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又给予了怎样的期待？进而言之，在这一论断的指引下，作为一名高等教育学者，我们有责任思考并在实践中探索：大学之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与经典的三大职能是什么关系？高等学校如何实现这一职能？哪些高等学校在实现这一职能方面应该发挥引领作用？以及每一所高校在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中扮演着怎样具体的角色？等等。

早在2009年，我根据多年的办学实践和理论思考，先后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宜宾学院学报》发表“充分发挥大学引领文化建设的功能”以及“大学的第四功能：引领文化”，2010年5月7日在人民日报（理论

版)发表文章“大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阵地”。除了上述大学文化专题的论文,还发表了大学理念、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制度变革和治理逻辑研究等相关系列论文。与学术论文撰写同步,还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大学理念与实践》和《追寻大学之道,实现教育梦想》等著作。由于有这些前期准备,加之自己又拥有践行这一职能的大学平台,研究课题“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职能机制研究”获得2012年教育规划课题(国家一般)立项。值得庆幸的是,正在这时获得了参加教育部的“千名中西部大学校长海外研修计划”美国东部团的机会。众所周知,“服务社会”这一职能是美国大学创立的,后来影响了全世界大学的发展,成为现代大学的经典职能之一。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学习中,我实地考察“服务社会”这一职能如何在所研修的马里兰大学 College Park 校区、俄亥俄州立大学实现的,所采取的方式是了解这两所大学的发展历程,与这两所学校的高等教育专家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我更加关注了美国的大学文化与美国社会文化间的相互支撑关系。美国的社会文化无不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自由民主、实用主义。在与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 Drezner 讨论时,他告诉我,美国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有三: Jeffersonian ideals of limite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Capitalism and the belief in the rationality of markets; More recently and after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 commitment to equal opportunity and social mobility。这三条哲学原则,充分体现了《独立宣言》的精神,因而美国的大学文化也就能根植于美国的社会文化。这正如哈佛大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艾略特校长所指出的那样:“当美国新型大学降临时,它将不是一个外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根植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和自然地结成的硕果。它将是美国受有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它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世界上无双的。”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美国大学成为了“科技革命的动力站”、“社会发展的轴心组织”,实现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外国经典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向人类文明贡献出美国文明的类型。

研修回国后,我组织课题组的全体同志全面地投入研究中。我们研究视角主要有三:一是从国际比较视角、二是从历史发展视角、三是从社会现实视角。这样,我们就把大学之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研究置于更广阔的

研究视野之中。同时,我们把中国大学传承创新的文化也划分为三种类型:外国的经典文化、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结合宜宾学院和四川理工学院的办学实践不断深化对中国大学文化本质的思考,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2013年,在《教育研究》第5期上发表《论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之路——基于大学文化视角》一文,结合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实践,从理念、制度、办学特色诸层面全面论述了大学文化的本质及其实践;2014年,在《中国高教研究》第2期上发表论文《论大学文化的内涵与本质属性》,进一步对大学文化的本质,即“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进行了详细论证。2015年7月18日,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全国高校书记校长培训班学员论坛上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之道的思考与实践》的学术演讲,首提中国社会主义的大学之道,即“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培养社会主义社会有责任感的公民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积极参与者,传承创新中华文明”,并首提大学的新定义,即“大学是本民族优秀文化和外国经典文化交融创新的中心,是本民族现实文化批判与创新的基地,是提高民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阵地,是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智力引擎和道德内核”。2015年9月,关于社会主义大学之道和大学文化本质的思考成果《论大学的文化本质》一文又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第9期上。这样,逐渐形成了从大学之道到大学文化本质,再到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实践机制的一整套初具体系的大学办学思想和办学观念。这些办学思想和办学观念,正有效地指导着我在四川理工学院的管理工作。

《大学文化职能新论》一书,是整个课题组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汇聚。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以文献分析的视角探究研究的起点、逻辑进程、理论基础、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为研究奠定基础。第一章“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概述”,主要阐述文化传承创新为何是大学的第四职能,大学的传承创新文化机制的矛盾关系,以及大学传承创新文化机制的主体结构。第二章“东西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比较”以比较的视角主要探讨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具有的普适性与差异性,为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历史审视”与第四章“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现状分析”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案例,既作为东西方文化比较

的个案进行研究,也为后续理论升华提供依据支撑。第五章“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机制建构”针对中国大学文化的现实与历史,并结合东西方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职能机制的理论,提出了中国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职能机制的选择和具体路径。结语部分“创新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对研究进行总结陈述,并对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未来提出新展望。

《大学文化职能新论》一书,是整个课题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我的带领下,课题组主要成员黄英杰、陈世海、田联进、贺永平、李咏梅等分工协作,辛勤研究。汪明义拟定全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思路。汪明义、黄英杰负责全书的统稿、修订和裁剪,并主要撰写了绪论、结语和机制建构的相关内容;陈世海、李咏梅负责了全书的理论基础以及部分章节的修订工作;田联进主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撰写了东西方大学文化机制的比较和概述等内容;贺永平主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撰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创新经验,以及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现状等内容。另外,郭平也参加了全书写作的研讨工作,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大学文化职能新论》一书,在撰写与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BGA120040)的资助。同时得到了宜宾学院、四川理工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众多同仁的鼎力相助。在这里,我向所有关心、鼓励、支持、帮助本书撰写与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考、借鉴、吸收了诸多同仁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工作经验,在此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诗经·小雅·伐木》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本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大学的文化使命研究仅仅是抛砖引玉,期待时哲大贤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以助力中国大学事业之繁荣,构建中国大学理论之世界话语权!

本书阶段性成果仅仅代表课题组成员的思想与观点,其中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汪明义

2015.8.1 于四川理工学院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概述	(35)
第一节 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第四职能	(35)
第二节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矛盾关系	(48)
第三节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主体结构	(61)
第二章 东西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比较	(76)
第一节 西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特征	(76)
第二节 东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特征	(89)
第三节 东西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比较分析	(101)
第三章 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历史审视	(121)
第一节 太学传承创新古典儒学的文化机制	(121)
第二节 书院传承创新宋明理学的文化机制	(130)
第三节 近代大学的科学民主文化创新机制	(140)
第四章 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现状分析	(158)
第一节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使命的异化	(158)
第二节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机制偏移	(169)
第三节 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问题归因	(182)

第五章 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建构	(196)
第一节 加强大学学术文化建设	(196)
第二节 明确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内容	(207)
第三节 完善大学文化传承创新途径	(220)
第四节 大学引领社会文化发展	(240)
结语：创新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明	
——中国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未来展望	(251)
一 文化传承创新职能是中国大学经验的普遍性理论概括	(251)
二 未来中国大学的文化使命是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	(258)
参考文献	(263)

绪 论

一 论题的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把“文化传承创新”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并列,作为高等学府一项新的职能。胡锦涛总书记还指出,要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必须努力实现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进人类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文化育人。虽然中国是文化历史渊博之大国,但是中国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兴起却源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文化理论的勃兴,随即商品化、世俗化的社会现实与大众文化迅速崛起成为了文化研究的现实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当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而存在时将与一个国家发展的命运息息相关。缘于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了构建文化强国的战略构想。从此,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就被作为一项有待拓展和研究的新职能进入高等教育学者们的理论视野,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成为中国大学争取世界高等教育理论话语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网络技术的支配下,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走向一个纯粹的文化时代。文化已然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大学作为知识的堡垒和科学技术的孵化器,其文化软实力更是决定了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潜力和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大学在实现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过程中不仅肩负传承、积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使命,承载创造和引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责任,而且还肩负着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引领人类文化发展的任务。优秀的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上一方面需要对民族文化、历史和现实文化、外国文化、大学自身文化的精华进行吸收、整合、传承和创

新,建设全新的大学文化;另一方面还需要在研究中对上述文化中不适宜或者落后的方面进行甄别和纠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会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于自身,从而创造一种引领时代发展的优秀文化。为此,优秀的大学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和狭隘专业的范围,坚守大学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本质,以追求真理为志业,发扬大学“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优良传统,努力于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为未来塑造崭新的文明。如此,大学才算真正实现了其本真的历史使命。那么,大学如何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其机制和主体是什么,它要采取怎样的方式和途径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文化传承创新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在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大学需要怎样的组织变革才能承担这一任务,等等,这些问题亟须理论的澄明和实践的探索。

(二) 研究的意义

其一,理论意义。大学是什么,大学与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大学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价值,是大学实践的前提预设。自从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端赖大学的发展。作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文化传承创新潜在地存在于大学演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确证着大学存在之合法性和合理性。研究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机制和功能,可以使我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大学的文化本质,理解大学之真理和价值,更好地从事大学的实践。在这个普遍理论的前提之下,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实践经验,继续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文化本质和文化属性,以及文化传承创新机制的具体特征,凝练大学的新定义,并在大学新定义的指导下建构中国社会主义的大学之道,为中国社会主义大学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其二,现实意义。世界各民族国家已经认识到,文化是民族国家的核心软实力,是民族发展、人类发展的动力之源,文化的传承创新则需要大学的崛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现实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境下，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大学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社会文化组织，应当对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国家软实力提升发挥主要的作用和价值。这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战略问题。

二 本研究的主要概念界定

（一）大学的本质与定义

大学看似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想到大学的时候，意识里会涌出一个自己熟悉的、生活过的建筑物的形象；普通人想到大学，会认为那是一个创造和传播知识的神圣之地；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想到的大学，则是自己所研究和向往的大学的形象，这些形象可以是中国古典书院的复合体，可以是“中华民国”大学扩大了的想象，可以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大学现实，当然也可以是自己所喜欢的西方世界的某一所大学，等等。至少从形象上说，每类人都会有自己所喜爱的大学。当我们争论大学是什么的时候，由于我们关于大学形象的立场不同，常常存有很多的分歧。然而，大学是什么，的确是一个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决定了大学的行为以及人们对这一行为的理解和支持。从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以来的近千年的大学发展史看，对于大学是什么大概有过六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回答。

第一类认为大学是学者的行会或社团。最初的中世纪大学主要就是教师的行会，它们吸收了中世纪城市行会的一些要素，组成了具有大学教学性质的机构。以至于德国近代大哲学家康德在1798年的《学科之争》中仍然把大学看作是特殊性质的行会，即由教授“一同构成一种自治的学术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和博士。^①德国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大学之理念》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①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①在这个定义中，雅斯贝尔斯明确给出了大学是一群以献身科学探索和真理传播为志业的人的联合体，而不是一群建筑物组成的物质的群落，它的根本宗旨在于寻求真理，培养新人。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更是直接用大师界定大学，“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②并把大学教学比喻为师生之间像鱼群一样的“从游”关系，^③大鱼在前面游，小鱼在后面跟随。

第二类认为大学是探索和传播普遍文化知识的场所。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红衣主教纽曼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在其传世名著《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他明确申诉，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④“应吸纳人类所有艺术、科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并使其适得其所。”^⑤它的目的在于向学生传播和推广知识，使他们养成“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⑥19世纪中叶在古典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之争中和纽曼处于对立地位的赫胥黎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个学术思想不受任何束缚的地方，是个能使所有的入学者获得所有的知识和掌握所有的学习工具的地方，而不管这个人的信仰、国籍和贫富如何……大学，指的是一个有关普遍事物知识的团体。”^⑦中国教育家，先后做过中华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也认为，大学的使命在于经由民族文化的创造“为人类增加知识的总量”，他说，“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的民族开发知识的宝藏，而且要为人类的社会，增加学术的遗产。”^⑧因为，只有建立在文化知识总量不断增加

① [德] 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9页。

②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102页。

④ [英] 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⑤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38.

⑥ [英] 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⑦ [英]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科学与教育》，单中惠、平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⑧ 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0页。

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始可能。

第三类指大学是探索和传播高深专门学问的机构,N. M. 普西在《学者的时代》一书中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① 创建德国柏林大学的洪堡指出,“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机构的顶峰”,“它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②,“一旦人们停止对科学进行真正的探索,或者认为,科学是不需要从精神的深处创造出来,而是可以通过收集把它广泛罗列出来的话,则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且将永远丧失殆尽。”^③ 教育家、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也持有这一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④ 强调大学对高深专门学问的研究而不是对普遍知识的研究,这是第三类概念与第二类概念的不同之处。

第四类指大学是独立思想和批判的中心。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是它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和美国教育家赫钦斯也是这一概念的坚定支持者。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所需要的东西(what the society needs),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否则大学就会犯荒唐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⑤ 雅斯贝尔斯则认为“大学是一个时代的智力良心(intellectual conscience),大学人不必为现实的政治负责,主要因为它对发展真理负有无

① [美] 约翰·S.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② [德] 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陈洪捷译,《高等教育论坛》1987年第1期。

③ [德] 彼得·贝格拉:《威廉·冯·洪堡传》,袁杰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9页。

④ 《蔡元培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⑤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5-6.

限的责任。”^① 在大学日益嵌入社会之中的当代社会，是否需要承担现实的政治责任，实在是考量大学和政治智慧的一个问题。赫钦斯更明确地倡导批判的大学理念，他认为大学“具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使命，这就是思考。大学是独立思想的中心，既然它是一个思想中心，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那么它也是一个批判的中心。”^② 当代著名法国哲学家福柯也持有这种立场，从解构学的立场出发，他认为，“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③

第五类指大学是社会服务站，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指出，“公共服务概念始于美国的赠地学院运动”^④，到康奈尔、威斯康星等大学这一服务理念逐渐成熟。克拉克·克尔是大学服务理念的支持者，他认为，在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中，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提供服务，而且在日益壮大的知识产业中，大学成了知识产业的中心，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大学也随之走入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进步的智力内核。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根据全球大学创业化浪潮的变革形式，凝练出“创业型大学”的概念。^⑤ 当代中国大学方兴未艾的协同创新，以及创新创业教育等也是这一理念在新时代的发展和表达。

第六类指大学是多元化的复杂巨型组织。其代表人物是以巨型大学概念闻名的克拉克·克尔。关于巨型大学，克尔总结了如下特征：学生数量庞大、种类多样，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应届在校生占少数，在职进修的占大多数；由若干群体组成，包括人文学者群体，社会学者群体，科学家群体，各专业学院群体，所有非学术人员群体，行政管理者群体，等等；

① Karl Jaspers,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London: London Peter Owen Ltd., 1965, p. 132.

② R. M.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p. 84.

③ [法] 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 页。

④ 朱国仁：《高等学校职能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1 页。

⑤ [美] 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路径》，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有千门甚至万门与社会的各个部门各个产业相联系的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校园庞大且不断向全球拓展,开支巨大但主要的费用并不是用于教学;其组成部门主要受市场支配,可随意删减;具有多重目的,传统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目的不再足够。巨型大学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将自己的各项活动与工业发展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校园的中心是图书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扩展到各专业学院和科学实验室,外围是工业,散布着宿舍楼、公寓楼和膳宿楼。通过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大学成功地把自已变为强大的知识产业。^①

(二) 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

以上关于大学的定义,不论从教师和学生(学者)的视角把大学定义为学者共同体,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把大学定义为普遍知识或高深知识的生产组织,还是从晚近大学服务职能的视角把大学界定为知识社会的一个复杂的服务机构,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也表达了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大学真理的不同面向,这其中也包含了不同哲学家和不同教育家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是弥足珍贵的。大学真理是一个多元和合体,不是单一定义所能界定的,换句话说,迄今为止即使我们用上述六类概念去解释大学,仍是远远不够的,大学的概念远超于这六类概念所包含的东西。理解大学就是理解我们人类自身,当中世纪的一群学者组成类似行会性质的大学,进行知识的教学和传播时,他们无疑像把火带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在人匍匐于上帝脚下的中世纪之夜空中点燃了神圣的知识之火,照亮了幽暗的人性。从此以后,知识的尊严和人之尊严通过大学的活动建立了恒久永固的联系,人不再是虚空的芦苇,而是有思想的强者。正是大学,载着不自满的人类更好地向人道前进。大学发展到当代,在教会已经式微,社会日趋物质功利化,政府也囿于局部利益纷争的情况下,无论大学怎样的“嵌入”社会,它们仍然承载着人类的希望和梦想,承担着使人类文明之火熊熊不息的添薪者的责任。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当代大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承担得更多。因为,“我们个人或社会行为的成功最终都建立在我们对自然、宇宙的认识之上;建立在我们对历史长河中的人类

^① 黄英杰、陈理宣:《大学人性本质的历史叙事——基于西方大学思想史的分析》,《重庆高教研究》2014年第2期。

的命运的真实信念之上；建立在关于善与恶以及如何区分善恶、关于真理以及区别真理与谬误的认识之上。在以往的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和看管人是牧师和各王朝的国王、皇帝、朝臣、官吏和部长。但是今天，所有这些人必须让位给全体学者。”^①

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讲演中就谈道，“大学的任务就是创造未来”。^② 当今时代，我们已经无可怀疑：大学已如怀特海所言成为了一个塑造未来的机构。但是未来者何？由于未来总是存于当下，问题因而就变成：我们当下的社会存在是什么？为此，大学将凸显怎样的内涵和特征以适应这一社会存在？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的在其《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认为，网络社会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文化仅指涉文化的新阶段”，即“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之中”，“文化相对于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获得了自主性”。^③ 文化真正成为了人之本质存在。在人的文化本质的形成过程中，“大学是这一现实在其起源意义上的肇始者……没有大学，现代社会将失去它最为重要的文化更新和新人之培养的重要工具。”^④ 当然，大学也受益于这一文化的结果，与人、社会的文化性一样，大学比以往更加地成为一个文化的存在，承担起文化创新的历史使命。借助于网络，大学的物质的形体将逐渐成为一种实体文化的象征，它的文化的虚拟身体将会无限制地延伸和扩张。也许，在将来某一天它的文化的形体将会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使不同肤色、种族、性别、年龄的人更加自由地理解和交流。在交流和创造中，人们会经由协商和对话建立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安身立命之意义根基。到那时，地球成为一个绿色的文化村庄，整个人类在这个地球村里和谐相处。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那仍然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虽然是可遇不可求

① [美] 约翰·S.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0 页。

② [英] 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60 页。

③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0, pp. 508 - 509.

④ 黄英杰、陈理宣：《大学人性本质的历史叙事——基于西方大学思想史的分析》，《重庆高教研究》2014 年第 2 期。